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大学董事会应该具有哪些特征?我们应该从美国这样董事会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学习什么?

大学董事会： 美国经验不可复制，但可借鉴

■本报记者 孙琛辉

董事会制度须遵循大学规律

不久前,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旋蕊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专著《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与效率研究》日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将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看做一个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制度安排构成的复杂制度系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和效率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剖析和评价,被业内专家认为是理论见解独到、深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旋蕊表示,《纲要》提倡的“高等教育理事会或董事会”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的董事会,但“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中国独创”。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国际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其最优化治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已经完美无缺,但必须承认,它确实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的。”王旋蕊引用其书中提到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加州高等教育规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和玛丽安·盖德(Marian L. Gade)的话指出,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对于维护大学自治,以及使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作出及时、灵活的反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美国之所以拥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如此,则在于它遵循了集体决策、谁决策谁负责、集体权力与个人权力、决策权与执行权边界清晰等大学治理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到1985年,广东韶关大学(现为韶关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普通高等学校董事会。2003年,华北电力大学划归教育部管理,同时成立由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特大型电力企业组成的董事会与教育部共建。继此之后,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等全国数百所高校都设立了校友会。但纵观近年来我国大学成立的董事会,其与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有着很大不同。

“在我国,校长是高校的法定代表人,我国大学当前所成立的董事会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董事会’。”王旋蕊解释,就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而言,除了华北电力大学等个别大学的董事会具有微弱的治理权力之外,绝大多数大学的董事会主要是为大学建立社会联系、实现产学研合作、寻求外部资助的一种方式,是基金会、校友会、政府和企业关系联络部的一种组合体。“即便是华北电力大学的董事会,也只能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规格和整体规划提出建议,但没有权力提名和任命校长,也没有权力决定教授的去留和学科专业的设置。也就是说,我国公立大学的董事会基本上不是作为一个治理机构存在的,更不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

王旋蕊认为,《纲要》提倡设立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是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尽管依然不属于大学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但其建设同样需要遵循大学治理规律。

董事会应为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

在美国的高校中,董事会而不是董事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机构。由于其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校外,因此董事会在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方面作用突出。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与权力机构,拥有选拔校长的权力,因此是维护大学自治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大学董事会常常被描述为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器”。但王旋蕊指出,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中,尽管董事会不是决策机构,也不具备以上这些功能,但美国制度的一些内容还是可以借鉴的。

例如,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非营利性大学董事不仅必须是自然人,而且必须是“志愿者”,不能利用职权为个人及其所在机构谋取经济或其他利益,否则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王旋蕊

指出:“我国已经成立的公立大学董事会在这点上与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董事可以不是自然人(董事单位),这是很荒唐的。”

当前,大学行政化、学校发展同质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国内部分中学生开始选择“洋高考”,挤入全球一流学府,从而对中国高校的优质生源产生突出的分流效应。同时,大学招生中的腐败问题、大学教授学术道德问题、大学的财政安全问题等也屡屡见诸报端。

对此,王旋蕊认为,这些表象背后的症结不只是个人道德品质,或者个别制度措施不到位,而在于在大学最为根本的制度设计当中,忽略了公众对大学治理应有的话语权。要使大学真正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己任,就需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让董事会作为社会公众的代理人参与对大学的治理,真正成为大学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是指董事会必须具有最高的治理权威,尤其要有任命和选举校长的权力;必须主要由校外人士,而且是自然人组成。能够而且热情地承担起自己的治理责任。董事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王旋蕊说,“当然,这些变革都应该在《高等教育法》允许的框架内进行,不能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生冲突。每一所大学都要有自己的章程,将这一治理结构写入章程之中。”

与此同时,王旋蕊也强调,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然都可以归结为没有成立董事会制度,但董事会制度并非万灵药,“一懂就灵”的期望势必会以失败而告终。每一种治理制度都离不开本国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这势必会影响到董事会制度的运行与发展。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还与董事、校长以及其他相关群体的素质、旨趣和修养有关,还与其他制度安排是否配套有关,而这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政府对待大学的态度。“总之,没有董事会不行,有了董事会也不一定行,关键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大学董事会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旋蕊说。



崇拜高学历加剧“考研热”

■胡乐乐

持续3天的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不久前平稳落幕,全国165.6万人确认参加,比2011年增加14.5万人,增幅达9.6%,再创历史新高。这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考研规模连续第三年以超过10万人的速度增长。今年这165.6万考生中,可能会有50万人成为新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剩下的100多万人要么面临就业,要么等待下一次考研,竞争之激烈,可谓残酷。

很多人不解的是,为何现在的“天之骄子”大学生纷纷热衷于考研,而不是直接就业?高等教育专业调研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2012届本科毕业生计划国内读研的首要理由是“就业前景好”。然而,读研后找工作真的会容易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编纂发布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表明,从就业率看,高学历与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已经显现。从2009年开始,硕士生的就业率首次出现低于本科生。2009年和2010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均不及本科生。特别是在2010年,从学历层次上看,在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中,硕士生的就业率是最低的。教育部对此保持警觉。

客观而言,大学生考研的主要原因有三大方面。一是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大家挤破头”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很多都在有意无意地追求高学历——学历高低与胜任工作有没有必然联系暂且不论,只要能招到高学历的人,就显得用人单位“级别高”、“上档次”、“倍儿有面子”,所以招聘时设定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本科生则一律免谈;二是很多本科生在校期间不学无术、虚度光阴,没有真才实学或一技之长,毕业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所以心里想还不如再上两三年,也许能学到点儿真本领,再就业时就有保障和砝码;三是盲从随大流,别人都在考研,自己不考会觉得没有志气或不如人,这其中当然还包括家长的鼓动,甚至强迫的因素。

然而,单就就业与高学历而言,在很多情况下,一流的本科生完全比二流的硕士研究生更能胜任很多工作的需要。举例来说,笔者的一位亲戚2009年西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当时,她听从老师的建议没考研就先就业,凭借自己的能力,应聘到南方某省会城市重点高中教书。隔年,她又凭借真实才能,成功跳槽到某省级金融机构总部从事管理工作。在工作中,她的领导一再赞扬她比很多同时招聘进去的硕士研究生工作做得更好。事实上,对用人单位来说,招聘的目的确实不是攀比高学历,而是真正招聘到更能胜任工作职位需要的人才,无论其学历高低。

并且,不学无术的高学历者一旦应聘成功,

招聘单位需要支付更多的工资,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加之很多女硕士研究生毕业即面临紧迫的生育问题,因此招聘硕士不免会加大用人单位,特别是私企的用工代价。如此来看,招聘一味跟风要“华而不实”的硕士而不要“真才实学”的本科,显然很不理性。

在笔者看来,大学生之所以愿意前赴后继地蜂拥加入疯狂的考研大军,或者悲催地成为陪考的“炮灰”,或者如愿以偿地暂时躲避了就业和社会压力,但最终可能还是会无奈地成为就业高不得、低不就的“夹心层”,这无非都是被客观

的就业环境所迫下的“从众效应”之举。如果政府和事业单位率先带头,普通岗位的招聘要求不再追求高学历,亦即本科即可,并且招聘的过程中不以学历高低论人,那么,很多大学生就不会再非要考研了。

笔者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2003年本科毕业后,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并成功进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其工作能力受到领导表扬。试想,如果当时限定报考学历为研究生,她要怎么就业,要么就得考研。如此来看,改变高学历崇拜,应该大大有助于给“考研热”退烧。

“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中国、欧洲和美国区别并不是很大,主要区别在于学生实际参与的项目数量和实际操作能力方面,这需要学生有更多的实习机会。”

IET 理事长麦克·肖特： 中国工程教育越来越国际化

■本报记者 孙琛辉

1月5日,欧洲最大、全球第二大专业技术学会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向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宁夏大学(物理电气信息学院)和中国计量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颁发了IET“教育合作伙伴”资质认证证书。此三所高校是继2011年3月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之后,国内又一批成为IET教育合作伙伴的院校。

IET理事长麦克·肖特(Mike Shor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工程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IET是工程师终身相伴的大家庭,我们希望能与中国政府部门、大学、企业以及学会和研究院所一起合作,协助中国更多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协助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国际化水平以便成为国际标准的专业工程师。”

了解好企业才能进入好企业

麦克·肖特认为,一份好的职业需要足够的知识来支撑,大学生必须在学校积累足够知识。他建议学生多看一些网站,多发现一些信息,不仅关注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而且要了解世界上现在发生了什么。“大学生要了解整个国际上的供应链是什么情况,中国在这个供应链上发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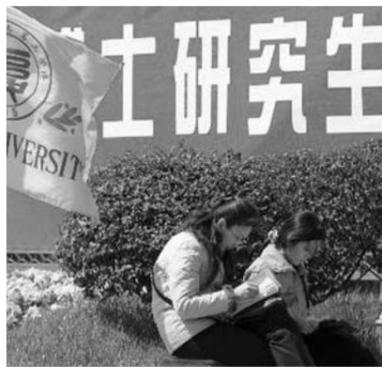
是什么作用,我个人认为国际化的工作更加有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IET国际运营总监恩也表示,企业需要最好的学生,学生也想去最好的企业。好的教育机构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也希望学生能尽早了解公司的情况。“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吧工程教育变得更有意思、更有吸引力,IET就致力于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企业工作的实际情况。”鉴于此,IET公司致力于赞助一些学生活动,如让学生与行业工程师交流、学生联谊、个人发展课程、研讨会、专题讲座等,以此提高学生的个人能力。

中西方工程教育应互相学习

在麦克·肖特看来,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中国、欧洲和美国区别并不是很大,主要区别在于学生实际参与的项目数量和实际操作能力方面,这需要学生有更多的实习机会。“这些技术不能全部在大学里就学会。学生会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交流。”

对此,恩也也有同感:“中国和英国大学之间的学习是相互的,可以把中国的大学和英国大学放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沟通,共同举办一些学术的交流、研讨会。这也是IET在中国寻找更多合作大学的原因之一。”目前,IET在北京邮电



大学国际学院推出了第一个教育认证。获得该认证,说明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国际认可的专业,这一点在国际层面上来说尤其重要。

据了解,IET对作为其教育合作伙伴的大学,将每年安排三次英国专家评估,评定其课程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IET 征集论文 35%来自中国

在采访中麦克·肖特提到,在IET征集来的论文中,约有35%的文章都是来自中国。“20年前,中国还没有这么多学术论文提交到国际学术期刊上。这一个数据就能说明中国工程的水平在快速发展,科研成果在大量走向世界。”

2011年是IET成立140周年,麦克·肖特也在这一年当选IET理事长。这是他第二次到访中国,他希望进一步推动学会在中国的发展。

麦克·肖特介绍,IET有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跟教育界的合作,一个是跟企业的合作。教育方面,IET主要通过引起大学生对出版行业的兴趣,帮助其培养更好的工程素质。该学会出版工程技术领域的22种学术期刊,500多种出版物,每年在全球各地举办大量国际会议和其他国际交流活动。据悉,IET已于2011年在我国启动教育合作伙伴计划和企业合作伙伴计划,以期为大院校和企业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

■侯定凯

不久前,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中国研究生,给我传了她所修一门课程的期末作业及任课教授的评语。作业是一篇专题性的文献评述。在批阅这篇作业后,教授给这位学生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除了“A-”的评分,教授还从语言和专业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论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封邮件的读者原本只有这位中国留学生,但其传达的意蕴却具有普遍意义,它生动地诠释了优质教育的一些基本元素,令人印象深刻。

教授回复的邮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点出了论文的亮点:“你的分析中包含了很多不错的观点”,“表明你很好地掌握了参考资料上的主要思想”。第二部分是核心,着重梳理了学生作业中的主要观点,并分析了“如果论文要从‘良好’变为‘优秀’应该做些什么修改”的问题。在梳理学生观点时,教授采用了这样的句式:“你说到了……,但你实际要说……”、“如果你这样说,那么观点会更加鲜明”。邮件的第三部分提出了论文更为合适的主题和思路,再次给予了学生反思全文全局的机会。而在邮件的第四部分,教授总结了论文写作的常规要求:“你应牢记,不同的素材和观点应该结合为一个整体;你的不同论点应该为主题服务;论文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明了的。”

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学生口头或书面表达中的思想亮点是散见而非系统呈现的。教师从学生杂乱的文字中中检拾和整理这些观点,一方面是对学生努力的认可——这样的鼓励方式胜过那些老生常谈的溢美之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向学生演示的关于思维条理性与表达逻辑性的范本。由于教授提出的评论和建议都是基于学生已有材料和观点,因此学生也更容易接受。

读罢美国教授的评语,笔者在想:写下这样的文字很复杂吗?其实每位认真阅读了学生作业的大学老师,都会自然形成自己的基本判断和想法。但很多时候,老师们并没有及时记录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意识到需要及时和学生交流这些看法,学生因此失去了一次接受教导的良机。

我感佩于这位教授的学术观察力和表达力,因为他让一篇思维和材料多少显得散乱的平常作业,通过精妙的点评,变得充满了情感上的激励和学术上的启迪,这是师生之间令人向往的一种学术对话方式。我还感佩于这位教授对于学生成长的责任感。

记得笔者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每当临近期末,班主任老师总会在成绩单上写下对自己一个学期表现的评语。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总能让笔者反复地阅读和感受。但进了大学,大学生们鲜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学生的学术表现被学分制、学分互换等制度压缩为一个个抽象的数字,最后“组装”为一纸文凭。对于一份期末作业,除了分数,学生还能从教师那里期待更多的反馈吗?即使教师认真评阅了学生的作业,学生是否能同样认真地去研读呢?

无论如何,教师不应该根据对学生行为的预设,来选择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我相信,这位美国教授的悉心评阅是其严谨的学术行为和功利工作心态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教师主动向学生传达对学术的真诚姿态,是引发师生良好互动,继而达成高质量教育的前提。这位美国教授的评语演绎了雅斯贝尔斯所揭示的教育真谛:“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大学教育质量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黑箱”,没有人确切知道学生的能力在校期间有多大变化,也没有人确切知道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历史上有多大改进。但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所言,虽然有些学习形式难以测量,如自我意识的形成、人生观的发展等,而其他许多重要的能力是完全可以测量和评价的,如学生的写作能力、数理推理能力、外语水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等。这就意味着:教师需要准确、敏锐地识别学生这些可评价的基本能力,持续地把识别的结果传达给学生,并在教学过程中强化这些能力的训练。

需要反思的还有:当我们自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出一项又一项“教学质量工程”时,这些政策措施有多少关怀到了日常课堂活动?政策的“宏大叙事”如何才能渗透到“和风细雨”的教育过程?高质量教育活动的基石,原本是师生之间达成的心理契约,一如上学期末作业评语所传达的专业精神,这种关系实在难以从外部加强。不同于普通商品质量标准的张力和直接,教育质量的生成通常是无数教育细节累加的结果。对于教师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恐怕是一个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活动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份期末作业评阅里的「质量保证」